TRANSLOGOPOEIA

A Fudan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V

复旦谈译录

第四辑

陶磊 | 主编　　戴从容 | 副主编

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 | 主办

上海三联書店

研究生论坛

杨欣 | 297

论苏曼殊、鲁迅、王国维在拜伦译介活动中的形象建构

——管窥20世纪初期浪漫主义在中国

曹禹杰 | 330

拓荒者的苦闷

——由刘呐鸥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翻译实践重审“软性电影”论战

附 录

标题与摘要（Titles and Abstracts） / 353

征稿启事（Call for Papers） / 36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谈译录．第四辑 / 陶磊主编；戴从容副主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2.9

ISBN 978-7-5426-7756-3

Ⅰ．①复… Ⅱ．①陶… ②戴… Ⅲ．①翻译-研究 Ⅳ．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17230号

复旦谈译录（第四辑）

主　　编 / 陶　磊
副 主 编 / 戴从容

责任编辑 / 王怡静
特约编辑 / 李志卿　齐英豪
装帧设计 / 微言视觉 | 苗庆东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齐英豪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書店
（200030）中国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331号中金国际广场A座6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22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22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89×1194　1/32
字　　数 / 303千字
印　　张 / 11.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7756-3 / H·115
定　　价 / 88.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538-3460929。

论苏曼殊、鲁迅、王国维在拜伦译介活动中的形象建构

——管窥20世纪初期浪漫主义在中国

杨欣 *

引言：20世纪初的“拜伦热”——觉醒的个体与精神资源的寻求

恶魔派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曾在中国引发“拜伦热”[1]，伴随着一股浪漫的、自我觉醒的风潮。如有学者已有提及，对喜爱的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的译介、模仿和认同，是这股外国化的浪漫主义风尚的重要表征。[2] 同样有趣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总体借由对浪漫主义诗人的推崇、张扬个性解放的潮

* 杨欣，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传统到现代文学、文化的转换。

[1] 《拜伦在中国》一书认为，拜伦在中国的传播有两次高潮，一次是从1902—1917；另一次是1917—1927年，尤其是1924年《小说月报》《晨报副刊》推出“拜伦百年祭”，更将拜伦在中国的传播引向高潮（宋庆宝：《拜伦在中国——从清末民初到五四》，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2] 李欧梵对此有精彩描述（李欧梵著，王宏志等译：《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第1版］，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280—282页）。

流之中，不同作者笔下的拜伦形象，却又不尽相同，甚至于截然相反。显然，热情的推介者们对于拜伦的形象与性格做了个性化的截取。

在这些对拜伦性格不同侧面的选择与描绘中，我们实际上看到了在世纪初“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知识构成、思想趣味、生活经验与西方浪漫主义资源所产生的不同呼应。他们对拜伦形象各异的凸显与描绘，亦展现了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外来思想资源[1]带有个性化的择取、融合的努力。

对西方浪漫主义的介绍与推崇总与个性主义、自我觉醒等命题相连。如已有学者指出的，在强调伦理秩序及人在伦理秩序中相应的言行举止规范的传统道德中，个人的生活与爱憎的表达是被压抑的，是较少被言说的。[2]因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东方与西方碰撞，“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时期，对凸显个人主义的西方浪漫主义的接受与推崇，是具有明显的革新意图与意义的。而曾经在这一时期引发过热潮的代表人物“拜伦”，或可作为透视这一现象的恰当切入点。

“自我的觉醒”以及随之而来叛逆情绪、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往往被视为“五四”时期的显著特点。然而，这些浪漫主义风潮的要素和特点，却早在帝国晚期最后十年已初现端

---

[1] 具体到本文，是西方恶魔派浪漫主义。

[2] 林毓生：“在中国（这个大的架构中），个人主义的价值并非是不辩自明的，同时也不是人生哲学（或态度）的终极目标。”（林毓生：《五四时期之激进的打破旧习主义与中国未来的解放主义》，班杰明·史华慈编：《五四运动的回顾：一个座谈会》，坎布里奇：哈佛东亚专题讨论，1972年，第25页。转引自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倪，直接呼应着“五四”时期的浪漫情绪及创作。[1] 显然，将“现代”界限的讨论焦点转向帝国最后十年——20世纪初期这一时段，是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晚清”时期价值的发掘，体现反拨以“五四”为“现代”起始标志的学术范式的尝试与努力。[2] 在这样的范式切换中，苏曼殊作为中国浪漫主义的“始作俑者”之一，其翻译和创作活动被重新梳理出来，其重要性被重新强调。但与此同时，在接受新的范式所释放的整体的、连续的历史视野的同时，本文意欲纳入与苏曼殊的主要译介、创作活动几乎活跃在同一时期（1906—1908），也曾汇入这股浪漫主义推介风潮，但又不以“浪漫主义”显著标签的鲁迅和王国维对拜伦的推介和阐释。一方面，这丰富了我们对于浪漫主义内容在中国初期传播样态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毫无疑义丰富了对这些文化巨人不同精神侧面的理解。

如王德威所指出，海内外学者在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上不落人后的同时，对于20世纪初期一系列文化巨人的思考与选择，却“并没有投注相等心力”[3]。伟大的作家、思想家的复杂

---

[1] 如杨联芬在其扎实的著作《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中，则直接将苏曼殊定义为“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始作俑者”，成为“五四浪漫作家的精神资源”（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8—219页）；李欧梵在《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就曾称苏曼殊和林纾为“激烈主观潮流的先驱”（李欧梵著，王宏志等译：《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第1版］，第73页）。

[2] 正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丛书”之一——《“晚清文学”研究读本》的“前言”所自述的那样：“丛书所使用的‘晚清’等概念，并不是简单的时间或流派的概念，而是特定的‘知识构造’的指称”，其主要的选编的对象，是“基于新的时代条件所产生的具有方法论自觉、洞察力以及生产性的研究成果”（张春田编：《“晚清文学”研究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3] 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捷克］普实克著，李欧梵编，郭建玲译：《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7页。

性，往往使得他们难以被归类。一生尤具“蔑视所有同盟和特性的孤立的巨人”[1] 特征的鲁迅，其青年时期对于以拜伦为“宗主”的“摩罗诗人”的推介，[2] 或正属于这样一种存在。鲁迅笔下的拜伦所代表的浪漫精神的要素，明显区别于苏曼珠及其下接的“五四”浪漫派的风格。而王国维，或许由于尤为为后人所提及的成就更多在于其《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等文艺理论、批评等方面的著作，其在1907年发表的对拜伦（王国维称为“白衣龙”）生平作传的文本，相对较少被论及。同时，将其纳入本文讨论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王国维之“白衣龙”小传，其有关拜伦生平重要事件的展示和鲁迅《摩罗诗力说》的叙述框架几乎一致，却展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拜伦形象——这就尤能体现两位作者对拜伦形象的不同“择取”。

要而言之，本文将分析1906—1908年前后苏曼殊、鲁迅、王国维三人对于拜伦形象的不同择取，借由“拜伦”这三位晚清时期重要智识者都曾书写过的“时代热点”作为透视焦点，一方面揭示浪漫主义代表拜伦形象在中国“个性化的建构”，同时将一些所谓的“现代特质”（如个体的觉醒、孤独、个性化的推崇与伴随的颓废情绪等），由作为“五四”时期的时代情绪，更上溯为20世纪初晚清帝国最后十年，体现出一种更为宏观的、连续的视角。[3] 另一方面，在承认“历

[1] 李欧梵著，王宏志等译：《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第1版），第27页。

[2]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3] 此处并非指20世纪之前就并无“现代”的质素存在，仅就本文篇幅所限以及所讨论的内容而言，只上溯到20世纪初期晚清最后10年。事实上，如王德威等学者，通过对晚清小说的考察，认为“五四”所高扬的许多旗帜和思想内容，在更长时段的晚清时期，已得到酝酿和铺垫（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时追溯”意义的同时，本文亦更加注重纳入重要的“点”做横截面考察、注重个案的分析和研究，由此，力图对现代性发生初期、新旧嬗变时期，对中国浪漫主义的早期传播做一考察。在具体行文中，本文力图立足于具体的文本，注重比较，希求“比较既周，爰生自觉”[1]，于对照中凸显三种拜伦的不同形象内容。

一、苏曼殊：歌颂情爱自由的叛逆者与传统才子情调的糅合

提到拜伦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乃至于“拜伦热”在中国的兴起，不能不提到苏曼殊对拜伦其文其人的翻译与介绍。

苏曼殊是较早在中国引介拜伦的人之一，李欧梵就曾说：“自从苏曼殊介绍了这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并通过有意地模仿自己的英雄而发动了拜伦狂热，拜伦可能成了在中国最受吹捧的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甚至超过欧洲浪漫主义之父鲁索（卢梭）。”[2] 也正如戴从容所言：“中国20世纪初出现的拜伦热与苏曼殊的声望和努力是分不开的。”[3]

总体而言，虽然苏曼殊是晚清时期几乎最早翻译引进拜伦、雪莱诗歌的人，但他对拜伦的翻译和引介，都还是零散

---

[1]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7页。

[2] 李欧梵著，王宏志等译：《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第2版），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3] 戴从容：《拜伦在五四时期的中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64页。

的、不成系统的。而苏曼殊之所以成为拜伦在中国有力的传播者，与其是说通过他的翻译甚至是写作（如《断鸿零雁记》等小说），不如说是通过他本人。正是他本人的行状，生动地展示了一个浪漫天才的形象。他浪漫率真的性情与放荡不羁的举止，都使得一种浪漫精神被具象化了。因而，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正是通过他本人对于拜伦的喜爱与推崇，从而加深了人们对拜伦的理解与接受。而“五四”的浪漫派，正是从苏曼殊那里，寻得了精神上的资源，等待着下一阶段的个人自觉高昂的年代的到来。[1]

苏曼殊对拜伦的引介活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较早地翻译拜伦的作品（五首诗）。苏曼殊共翻译了拜伦五首作品，分别是《赞大海》《去国行》《星耶峰耶俱无生》《答美人赠束发哄带诗》及《哀希腊》。[2]《留别雅典女郎》一首，苏曼殊在《文学因缘自序》中自陈其为故友所译，[3]故不计入苏曼殊译作。

此外，苏曼殊还多次在其编译的书的序言中论及拜伦，这是我们了解苏曼殊的“拜伦观”的一个重要管道。这些文献主要有《拜伦诗选自序》《文学因缘自序》《潮音自序》及《〈潮音〉跋》几篇。

具体而言，苏曼殊对于拜伦的解读和理解可分为以下几个

---

[1] 如杨联芬曾论及，与郁达夫气质极为相近的作家王以仁写了一篇小说《神游病者》，小说主人公就常持有一本苏曼殊的《燕子龛残稿》（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第219—220页）。苏曼殊对“五四”浪漫派作家的影响，可见一斑。

[2] 译文见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版）第1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45—54页。

[3] 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版）第1卷，第85页。

方面：

首先，苏曼殊曾多次对拜伦援助希腊的义举高度评价并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共鸣，赞扬拜伦的义举。在《拜伦诗选自序》中，苏曼殊像当时所有为拜伦援助希腊的义行及《哀希腊》一诗所感奋的人们一样，高度评价拜伦的行为是“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的义举。

这种情绪同样也体现在《〈潮音〉跋》中。在托名为飞锡写作的《〈潮音〉跋》里，苏曼殊曾描述自己于积雪的月夜泛舟中禅寺湖，当此之时，他“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2]。在这里，这种吟咏《哀希腊》而至于歌哭的行为，体现出一种在同样的民族危亡的背景下由拜伦的义行所激发的感伤时事之感。联想到苏曼殊自身对于革命的热情，他这样感情充沛的举动，显然不乏出于对拜伦义举的情绪共鸣。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描绘，有着某种自我表演和自我形象展现的性质。这里所体现的，既是苏曼殊的家国情怀，也是他对于为追求自由而行动的信念的认同。与此同时，雪夜泛舟的情境，显然又让人联想到《世说新语》中所描述的魏晋文人的行状。这显然是将魏晋风流——一种艺术化的士人精神和行为——同西方的浪漫主义精神糅合接通起来了。

与此同时，更详细地展现了苏曼殊对拜伦的理解的文本是《潮音自序》[3]，在这篇以英文写作的序言中，他对拜伦和雪莱的诗作进行了比较，突出了拜伦的性格。在这里，拜伦的形象

---

[1] 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版）第1卷，第86页。

[2] 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2版），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年，第260页。

[3] 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版）第1卷，第89—90页。

是和恋爱联系在一起的，并和雪莱相比，展现出其热情、激烈、善于行动的一面。

苏曼殊认为：拜伦和雪莱，他们写作的题材虽基本和恋爱、恋人及恋爱的幸福有关，但在表达的手法上，却是极为不同了（“although both wrote principally on love，lovers，and their fortunes，their modes of expression differ as widely as the poles”[1]）。这里苏曼殊主要论述了拜伦和雪莱作品风格的不同，但其中已经包含着苏曼殊对二人性格上的区别的认识。他意识到拜伦的作品是富于刺激性（“like a stimulating liquor”[2]），他的作品是火山喷发式的作品（“in sentimentality，enthusiasm and straight-for-wardness of diction.”[3]），这似乎也在昭示着拜伦本人热情、直接甚至于易走极端的性格。而相对应的，雪莱却是“审慎而多思的”（“judicious and pensive”[4]），他对于爱的热情从未以一种喷发式的方式表达出来。“他的诗则更像月光，安静而美丽的、平静而令人欲睡，映照在深沉而静寂的水面上。”（“His poems are as the moonshine，placidly beautiful，somnolently still，reflected on the waters of silence and contemplation.”[5]）在这里，苏曼殊所展现的拜伦和雪莱的区别，显然更有着思考者和行动者的分野的色彩：“雪莱是在爱中寻求涅盘，而拜伦却是在爱中寻求行动，并为爱行动。”（Shelley sought

[1] 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版）第1卷，第89页。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第90页。

Nirvan in love；but Byron sought Action for love，and in love.[1]）雪莱的兴趣在更为深奥玄妙的领域，而拜伦却是指归在动作——这倒是和鲁迅对拜伦的行动者的特质认知不谋而合了。在苏曼殊的叙述中，和月光般幽寂的雪莱相比，拜伦显然是更像象征着活力与热力的太阳的。

而在《文学因缘自序》中，苏曼殊说："顾欧人译李白诗不可多得，犹此土之于 Byron 也。"[2] 将拜伦在西方的地位模拟为李白之于中国。对比他将雪莱比作李商隐和李贺的说法（"尝译其《含羞草》一篇，峻洁无伦，其诗格盖合中土义山，长吉而镕冶之者"[3]），也可见苏曼殊对拜伦和雪莱性格及文风的区别与把握。

此外，对于拜伦，除上述有着家国情怀的义士形象，着重于恋爱及恋爱描写的性格热情、激烈的诗人的描述之外，苏曼殊还自作有与拜伦相关的诗作，主要是《题拜伦集》和《本事诗十章·其三》两首。在这些诗中，苏曼殊以拜伦自比，显然将自身性格投射为拜伦形象的一部分，更透露出传统士人的形象和色彩。他在《题拜伦集》中写道："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4]"词客飘蓬"一句，透露出对与拜伦远走他乡相似的漂泊命运的共鸣感，并感慨深沉。但在这份认同中，也包含着苏曼殊以己之性情对拜伦形象所进行的改造，他在《本事诗》第三首中写道："丹顿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朱弦休

[1] 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版）第1卷，第90页。

[2] 同上，第85页。

[3] 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版）第2卷，第20页。

[4] 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版）第1卷，第33页。

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语难。”[1] 显然这里的拜伦更被赋予了传统士人才高命薄、孤高自许的形象。如果说这首诗歌的前两句还算对两人共同命运的喟叹，那么后二句的“孤愤酸情”等，则更近于苏曼殊的自况。

再结合他其他的诗作来看，虽有如《落日》[2] 这样意象宽广、情调慷慨的作品，但更多的还是以“脂”“愁”“泪”为意象，充满着人生无奈与伤感的诗作，郁达夫就曾评价他的作品“缺少雄伟气”[3]。他的诗作虽有着一腔真率之气，冲淡了诗歌的柔靡之感，但在情调上的确还是与传统才子中幽情婉转的一支相合流的。

因而，虽然苏曼殊已经意识到拜伦性格中激烈、富于行动的一面（这体现在他对拜伦和雪莱性格区别分野的论述之中，如上文所述），但又不自觉地将传统士人的“家国情怀”“孤愤酸情”“寒士命薄”之感投射在拜伦身上。而这，如果我们对比鲁迅的“挣天抗俗”“独战众数”“强力意志”的拜伦（将在下一小节中详述），就能体会到明显的不同，从而理解到作者本身个性之色彩在拜伦形象中的投射。

---

[1] 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版）第1卷，第27页。

[2] 《落日》：“落日沧波绝岛滨，悲茄一动剧伤神。谁知北海吞毡日，不爱英雄爱美人。”（同上，第29页）

[3] 郁达夫：《杂评曼殊的作品》，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版）第4卷，第62页。

二、鲁迅：多重悖论的丰厚形象与深厚的文化哲学意味

1. 鲁迅对苏曼殊的不满

有趣的是，同样认真介绍拜伦，与苏曼殊本人为好友的鲁迅，却对苏曼殊与拜伦的因缘略有质疑。他认为，苏曼殊在作了《寄弹筝人》后，便远离了（他所认为的）真正的拜伦。鲁迅在《杂忆》（收入《坟》）中提到苏曼殊对于拜伦作品的翻译活动后写道："苏曼殊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作诗'寄弹筝人'，因此与 Byron 也还有缘。"[1] 言下之意，作过《寄弹筝人》[2] 的苏曼殊，便已经与拜伦无缘了。鲁迅这里所说的《寄弹筝人》，据柳无忌记录，《寄调筝人》三首最初发表于1910年12月出版的《南社》第三集上，大致推定写作时间为1909上半年的作品。[3]

仔细阅读这三首诗的内容，诗中展现了一种非常矛盾的倾向，既是禅心的"空色相"，又是对恋人愁苦的思恋（"几度临风拭泪痕"）。由苏曼殊的个人经历来看，这种矛盾与其说是苏曼殊的修佛与爱情之间的矛盾，不如说是他从小无爱、贫困、漂泊的生活，让他在接近爱时，反而产生无限的痛苦与恐慌，于是转而以禅佛来逃避爱情以获得心灵的平静。

---

[1] 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233页。

[2] 此处鲁迅所说的《寄弹筝人》，应即是指苏曼殊的《寄调筝人》三首。其一："生憎花发柳含烟，东海飘零二十年。忏尽情禅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经眠。"其二："禅心一任娥眉妒，佛说原来怨是亲。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其三："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日日思卿令人老，孤窗无那正黄昏。"（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版]第1卷，第30页）

[3] 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2版），第11页。

《寄调筝人》中“偷尝天女唇中露”的宣言，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仍然是十分真率大胆的。联想到十几年后湖畔派诗人书写一首给“妹妹”的情诗，仍被批评为“不道德的文学”，引得周作人专门作《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一文为其辩护，[1] 便可见苏曼殊诗中这样的发言在其生活中是如何前卫。当然，这首诗所展现的内容，也不无传统风流才子的情调（让人联想到文人士子狎妓的传统），稍有不慎，便流于猥亵。但无论如何，这三首诗所写的是苏曼殊的爱情生活这是无疑的了。

而以笔者之见，与其说是苏曼殊由此诗便“远离”了拜伦，不如说苏曼殊一开始对于拜伦的理解，就是以爱（尤其是恋爱）和自由为核心的。鲁迅对于苏曼殊的这种“挑剔”所展现的，其实是二人对拜伦理解与形象择取的不同。[2] 这将在文章的接下来部分讨论。

2. 鲁迅笔下的拜伦形象

相较之下，相比苏曼殊笔下的突出恋爱、自由，并不乏传统文人才子情调的拜伦，鲁迅所塑造的“摩罗诗人”（恶魔诗人）代表的拜伦，所展现的形象内涵具有更强烈的现代意味，同时也呈现出一种“现代”式的分裂与复杂。其内涵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反抗精神、强力意志、争天拒俗同厌世

---

[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6—127页。

[2] 鲁迅认为苏曼殊作了《寄调筝人》后便与拜伦无缘了。显然是对拜伦性格侧面中“花花公子”一面的拒绝。事实上，由北冈正子考证得知，鲁迅的确“没有从拜伦的快乐主义和女性观中选取任何材料。”（［日］北冈正子著，何乃英译：《〈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页）。

情调的并置；二是自由主义同人道主义的并置；三是“进化”精神同对“启蒙理性”（与线性进化观点密切相关）的怀疑的并置。以下为详述：

（1）反抗精神、强力意志、争天拒俗与厌世情调的并置

鲁迅对于拜伦的描述，主要集中于1908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这篇文章之中。在《摩罗诗力说》中，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描绘了这位有着复杂性格的“摩罗派宗主”拜伦。

毫无疑问，富于反抗精神、具有强力意志、强烈的复仇心态及争天拒俗的姿态，是鲁迅意欲突出的拜伦的性格的主要侧面。这也是以拜伦为源头的其他“摩罗诗人”所具有的基本形象特征。因而这一点也常为学者所注意到。[1] 但正如鲁迅没有把所有的“摩罗诗人”均统一为一种面貌，鲁迅也同时看到了拜伦身上几个互相矛盾的性格侧面，尤其是对“厌世”这一点的强调，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由文本细读可知，首先，鲁迅在讨论拜伦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形象时，就一一指出这些人与拜伦本人性格的相似之处：

在详述《海贼》（*The Corsair*）主角康拉德种种形状后鲁迅写道：“裴伦之祖约翰，尝念先人为海王，因投海军为之帅；裴伦赋此，缘起似同；有即以海贼字裴伦者，裴伦闻之窃喜，篇中康拉德为人，实即此诗人变相，殆无可疑已。”[2]

---

[1] 如张静《初识浪漫——清末民初中国作家眼中的雪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3期）以及戴从容《拜伦在五四时期的中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都强调摩罗诗人反叛抗俗的一面，并以此来和其他作家诠释的拜伦或雪莱对比。

[2]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8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在描述了曼弗雷德不因自身巨大的痛苦而从魔鬼处寻求忘却解脱的情节后，作者写道："曼弗列特意志之强如是，裴伦亦如是。"[1]

这些对拜伦作品中主人公的评价，显然也构成了鲁迅理解中的拜伦性格的一部分。

但与此同时，拜伦前期的经历，也正如上述所提到的书中人物哈洛尔特、曼弗列特、康拉德及卢希飞勒等一样，有不平而厌世、厌世而希灭亡、为人楚毒而至于破坏复仇，或者蔑视道德而嘲弄社会的另一面，只是还并未像曼弗雷德那样自愿远离人间。[2] 因而，哈洛尔特的厌世情绪，曼弗列特的自我毁灭倾向、康拉德和路西法的复仇、破坏、毁灭心理，唐璜的玩世不恭，这些都是拜伦性格中的应有之义。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五小节开头详述了这种由自尊至而至于厌世、二者并存的性格特征，他认为：

> 自尊至者，不平恒继之，忿世嫉俗，发为巨震，对蹠之徒争衡。盖人既独尊，自无退让，自无调和，意力所如，非达不已，乃以是渐与社会生冲突，乃以是渐有所厌倦于人间。若裴伦者，即其一矣。[3]

---

[1]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9页。

[2] 《摩罗诗力说》："凡所描绘……或以不平而厌世，远离人群，宁与天地为侪偶，如哈洛尔特；或厌世至极，乃希灭亡，如曼弗列特；或被人天之楚毒，至于刻骨，乃咸希破坏，以复仇雠，如康拉德与卢希飞勒；或弃斥德义，蹇视淫游，以嘲弄社会，聊快其意，如堂祥。其非然者，则尊侠尚义，扶弱者而平不平，颠仆有力之蠢愚，虽获罪于全群无惧，即裴伦最后之时是已。彼当前时，经历一如上述书中众士，特未欷歔断望，愿自逖于人间，如曼弗列特之所为而已。"（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81—82页）

[3]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81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的论述中，体现拜伦“尊侠尚义，扶弱者而平不平，颠仆有力之蠢愚，虽获罪于全群无惧”这样带有拯救者英雄色彩的一面，鲁迅认为这只是拜伦最后时期的特点（“即裴伦最后之时是已”），而在此时拜伦做出了援助希腊的义举。而早前的经历则更接近哈洛尔特、曼弗列特、康拉德及卢希飞勒等人。这些人物所体现的特质，远不像一个传统的光明、伟大的英雄，反而更具有现代意味上的颓废色彩。可见，在鲁迅的认知里，拜伦的颓废而厌世，伤痛而复仇的一面，至少是与拜伦“尊侠尚义”“扶弱不平”的一面具有同等的分量的。因此，鲁迅之对于拜伦的理解和诠释，应该并非如北冈正子所说，没有描绘拜伦“怀疑生活和自我苦恼的一面”[1]，而仅仅突出了英雄的拜伦。

厌世和自毁情绪，都与一个高度自由而独立的人格相联系，正如普实克所言：“对自我及其存在于意义的觉醒伴随的另一个特征，即对生活悲剧性的感受”，“存在的全部内容和意义都在现世生活中，因此，一切阻碍人去充分发展与享受存在的东西都必须清除，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暴力。然而，这种心理的另一面却是自我毁灭的倾向。如果没有前世来生，只有现世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又毫无活下去的价值，那么，最好还是就此了结它。”[2] 换句话说，无论是斗争的情绪，还是厌世、自毁的情绪，都是基于个体自我的充分独立与凸显（“自尊至者”）这一点的，在鲁迅所描绘的恶魔英雄形象核心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

[1] ［日］北冈正子著，何乃英译：《〈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第4页。

[2] ［捷克］普实克著，李欧梵编，郭建玲译：《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第2—3页。

（2）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并置

而为鲁迅版拜伦带来更为复杂内涵的，是鲁迅自主地“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并置。通过考证鲁迅写作《摩罗诗力说》的资料来源可知，鲁迅自发地、原创性地为拜伦的形象内涵中加入了“人道主义”内容，并将其与“自由主义”并置。而将这两种具有矛盾的思想特征并置，也是鲁迅所独有的精神世界特征。[1]

关于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并立的说法紧接着他对于卢希飞勒的讨论：“由是观之，裴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2]

据北冈正子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考证，鲁迅《摩罗诗力说》中拜伦部分材料来源为日本木村鹰太郎的《拜

[1] 对于“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鲁迅有过一段自述：“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以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鲁迅：《两地书［1904—1926］》，《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93页）林毓生在其所著《热烈与冷静》中考订材料后发现，这段话是鲁迅增删过的。原文为：“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以‘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他引用了鲁迅对“个人的无治主义”的解释后指出，“个人的无治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或“安那其个人主义”。而对于人道主义的含义，林毓生总结道：“鲁迅给许广平信上说的‘人道主义’接受没有条件的、服从超命令的、宗教意义上的献身。……鲁迅所欣赏的人道主义理想是带着托尔斯泰身影，那含有至上的、绝对的情操。鲁迅的‘个人主义’……那是倍尝人间无边黑暗、无理与罪恶后所产生的反抗任何权威、任何通则的思绪，以为除了满足自己的意愿之外，一切都是假定的。这样的‘个人主义’没有是非，没有未来，只有自我的任意性，而具有任意性的不同思绪与行为之间也无需任何合理的关联。”（林毓生：《热烈与冷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2]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81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伦——文艺界之大魔王》。北冈正子经过仔细比对后指出，将自由主义同人道主义并置的内容，并非原材料所有，而是鲁迅自己的观点。[1]

而正是这种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并立的观点，使得他对强力的歌颂，没有如他参照的作者、木村鹰太郎那样走向对弱者的蔑视，即所谓“欲达到其目的不惜将万物作牺牲”[2]。鲁迅推崇进化，并以此期待民族的新生；但他的思想却未走向优胜劣汰一端，而是“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3]。“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哀和怒的起源，均是源于爱。由此，他认为拜伦的“好战”也已经脱离了兽性的争斗，而转而是为独立、自由、人道而战斗不止（“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4]）。

（3）主张“进化”和怀疑“启蒙理性”的并置

鲁迅描绘了这样一个个性鲜明、内涵丰富的恶魔诗人形象，展现的富有张力的悖论并不只“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并置一种。

鲁迅持有进化论的立场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摩罗诗力说》一文，显然有着强烈的文化批判意图，即以进化论为依据，展开对传统“怀古”“尊古”思想的批判，同时与此相对地提出了求新、求变、贵力尚强等主张，作为具有显著启蒙主义色彩破和立的两个方面。

但与此同时，正是又在对恶魔诗人所具有的主观性、个人

---

[1] ［日］北冈正子著，何乃英译：《〈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第4页。

[2] 同上，第4页。

[3]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82页。

[4] 同上，第84页。

性的推崇中，却又同时产生了对于启蒙话语中科学与民主所带来的现代生活的质疑。在这一点上，鲁迅的思想无疑是超前的。

首先，在进化论观点笼罩下拜伦形象具有了文化批判的内涵。

在《摩罗诗力说》第一节，鲁迅首先分析阐述了曾经有着辉煌文明的古国如天竺、希伯来、伊兰埃及等，它们由辉煌灿烂走向式微的原因，[1] 正是在于抱残守缺的文化态度。鲁迅认为，“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而“所谓古文明国者……中落之胄，故家荒矣，则喋喋语人，谓厥祖在时，其为智慧武怒者何似”[2]，正是因为今日衰败了，反而处处夸耀自己曾经如何阔过，鲁迅认为这种“怀古”的态度是不恰当的。

相对的，真正的怀古，应该“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是以史为师，以往为鉴，而进“光明之长途”；既不停下前进的脚步，又不遗忘“辉煌之旧有”，从而达到“新者日新”“古亦不死”的目的。[3]

在鲁迅看来，真正“意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4]，为求复兴，不应抱残守缺，夸耀自大；而应以把目光放在自己之外，通过比较生出自觉，发现自身文明之优长与缺陷。而正是顺着这个思路，鲁迅提出“别求新声于异邦”[5]，引介以拜伦为宗的摩罗诗人。这是我们

---

[1] 在鲁迅的叙述中，这些国家曾经“负令誉于史初，开文化之曙色”，而今却“转为影国”（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5页）。

[2] 同上，第67页。

[3] 同上，第67页。

[4] 同上，第67页。

[5] 同上，第68页。

理解“摩罗诗人”所不可忽视的背景。

同样，鲁迅站在进化论的角度，否定了我国传统中将理想世界寄托于远古的观念。在第二节开篇，鲁迅首先以自然和人事两方面的例子来论证：“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而只有求新求变，方能面对于严酷的现实处境，于其中存活下来。而相应的，鲁迅批判将理想之国寄托于“人之所莫至之区”，或是“迟之不可计年以后”，再或者即是“心神所注，辽远在唐虞，或径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尤其对后者，即我国的“怀古”思想，进行了“解构”。他认为，人们对远古的怀想，只是由于时间湮灭了古人流血流汗的痕迹，于是人们将目光放置于古时，就仿佛那时只有快乐，没有辛勤流汗。但实际上那时的人们为生存而做出的努力抗争，即使不比今日更艰难，也至少于今日大致相同。而抱着这样乌托邦的幻想去怀古，则只能“束手浩叹，神质同隳焉而已”。[1]

与对主张“平和”，缺乏勇猛刚健文化精神的批评相联系，是鲁迅对具体的文学观念“诗无邪”的批评。鲁迅认为，“诗无邪”的观点是与维持“平和”，也即一种不思变、缺乏活力的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平和”）——而开篇之中鲁迅所举出的曾经“开文化之曙色，而今转为影国者”的古国的衰落，正与此有关。

我国古代的山水游记、感时悲世、抒发身世之感的诗歌，自然不可能全为“颂祝主任，悦媚豪右”的献媚之作。接受传统教育出身，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的鲁迅，[2] 出此“惊人”

---

[1] 本段引文皆出自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9页。

[2] 科举未废之时鲁迅参加过考试，据说“考得还不错”，可见其对传统文学及文化是有着相当的熟习及了解的（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页）。

之言论，必然不仅仅只单纯为了表达一种偏激。

笔者认为，鲁迅对“诗无邪”的批评需结合紧接着的下面这一句来理解：“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1] 这显然与传统文化对于人鲜明地展露个体爱憎的规范乃至于压抑有关。从这个角度而言，一种具有革新性质的异于传统文化的要素，正在对个体的人的发现——自然包括表达他 / 她的所爱所憎。这或许也是近年对明清研究中对人的“情欲”表达进行关注 [2] 的立足点所在：这其中蕴藏着人从层层伦理道德的紧缚中解放出来的信息，包含着一种更具有现代意味的人之自由与解放，普实克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书写的意义出发点，也是基于此。[3]

显然，鲁迅对于具体的文学观念和文体的批评，是有其文化观察、判断及意图在其中的。他在这样的诗歌观念中看到了对“人”和人的“自我”的压抑，而这种压抑，与让国家失去活力的“污浊之平和”相关。

在鲁迅看来，传统文化之所以失去生气，就在于其对个体，尤其是个体活力（这往往与个人的情爱、欲望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压抑。而这种压抑（虽不一定压抑于“传统”），往往又导致了另一种补偿性、但又更具破坏性的释放。[4]

---

[1]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1页。

[2] 如熊秉真、余安邦编：《情欲明清》，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年。

[3] ［捷克］普实克著，李欧梵编，郭建玲译：《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第1—2页。

[4] 刘剑梅就曾以个人爱欲激情的别处释放来解释一些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件：“爱情、性和生命的本能冲动被引导或者转换为更高程度的力比多满足。用马尔库塞的话，就是‘生理驱动变为文化驱动’。”（刘剑梅著，郭冰茹译：《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36—37页）

因而反过来，鲁迅推崇能发为激响，为沉痛着作大之声的诗人，也即恶魔诗人。由此，鲁迅所要提倡的摩罗诗人，除了是一个诗人——一个文学意义上身份以外，还是一种新的文化品格，用李欧梵的话来说，即普罗米修斯式的生机勃勃的英雄。[1] 他们有高昂的自我，因而他们的诗歌也发为雄大之声，体现出一种壮美的风格。鲁迅之提倡摩罗诗人，推崇拜伦的恶魔性格，其落脚点实际在此。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其立人救国主张："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2] 可见，鲁迅之论述摩罗诗人及其作品，有其强烈的文化意图："摩罗诗力说"是他对于古国文明如何焕发新生所提出的方案。

与此同时，我们或还可以顺带论及的是：鲁迅虽然毫不留情地批评传统，但他在面对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文明时的文化姿态，却是将欧洲文明作为与自身文明异质的、并立的姿态，而非如苏曼殊和章太炎等人通过模拟其为我国的李贺、李白的方法将其内化为自身文明的一部分。[3] 这种姿态，却正好显示了鲁迅对自身传统文明的认可，甚至是某种自信。如同伊藤虎丸所说："鲁迅的这种异质性的认识本身，就表现了中国

---

[1] 李欧梵著，王宏志等译：《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第1版），第296—297页。

[2]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

[3] 这正如李欧梵在评价苏曼殊和林纾在面对外来文明时所评价的："他们在自己的气质与经验中寻求类同，以面对西方外来的冲击。"（李欧梵著，王宏志等译：《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第2版］，第74页。）这或许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来说明苏曼殊、章太炎等人的文化姿态。

传统文明所具有的坚韧及其对欧洲文明的‘抵抗’。”[1]

但与此同时，鲁迅虽然持有进化论立场，对传统文化及体现其思想内涵的诗歌主张进行了批判，并破而后立地提出了“摩罗诗力说”，推崇自我高度独立、发为雄大之声的“摩罗诗人”，由是使人“个性张”，而“沙聚之国”转为屹立天下的雄国。但也正是由于对个人独自性的高度关注，以人之“独自性”为根柢原则，鲁迅对于科学对人造成的新的异化、民主所造成的“以多凌寡”的新的暴政，也提出了质疑。鲁迅的这种主张，与其对尼采、施蒂那等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吸收紧密相关。这又反过来对启蒙主义式的理想与话语造成了消解。这亦是鲁迅笔下的“摩罗诗人”拜伦所具有的内涵。

事实上，在《摩罗诗力说》中已不乏对尼采的直接提及（如开篇则引尼采著作中的话[2]，并对尼采的善恶观进行讨论[3]等）。而无论是贵力尚强的思想，还是上抗天帝、下制众生的姿态，抑或是“所遇无不庸懦，则生激怒”[4]的傲岸的激情。独异个体与周围的环境形成尖锐的对立，并显示出对淹没于“庸众”的顽强拒绝，这些都让人联想到尼采的思想。

此外，有学者辨明指出，除了尼采，鲁迅还吸收了施蒂纳、吉尔凯廓尔的思想。相对于尼采赋予鲁迅的情绪和风格，正是施蒂纳赋予了鲁迅个人主义思想以系统性和完整性。[5]但无论

---

[1] ［日］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译：《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3—84页。

[2] “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涌于渊深，其非远矣。——尼佉”（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5页）

[3] 同上，第66—67页。

[4] 同上，第93页。

[5] 汪晖：《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5—123页。

如何，鲁迅笔下以拜伦为代表的恶魔诗人，显然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资源做了大量吸取，并把由此形成的对个体独自性的强调，作为价值取舍的尺度。

正是由此，鲁迅不仅反对传统以儒家为主的伦理道德规范对于个体的压制束缚，同时也十分警惕现代民主制度和科学文明带来的对人的新异化。在鲁迅而言，西方宪政民主存在以多凌寡的问题（“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1]），而科学“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现实生活，胶不可移，惟此是尊，惟此是尚”[2]——这样的表述已经蕴含于启蒙方案内部的对于启蒙方案的质疑与消解。

由此，鲁迅的“恶魔诗人”，其独立、反叛与抗战，其思想内核根源，在于对“个人的独自性”的极端强调与关注。他不仅不属于传统，也不属于进化论线条下的“现代”。由此，他的抗战注定孤独，甚至注定失败，于是只能“彷徨于无地”[3]。

这样复杂而具有哲学意味的形象内涵，以及其随之而来的历史沉重感，使得鲁迅的摩罗诗人在20世纪初期就显得独树一帜。“摩罗诗人”有着普实克所论及的，当个人从传统伦理和宗教中解放出来后对自我的关注、反叛，以及随之而来的厌世、自我毁灭等体验，也有着李欧梵之所谓浪漫英雄身上的悲剧性层面（而这正是当时的苏曼殊和后来的五四“浪漫一代”们所缺乏的）。摩罗诗人所展现的形象内涵，不仅仅是对自我生活、个人爱憎的关注，更包含着历史嬗变时期特殊的历史感

---

[1]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6页。

[2] 同上，第49页。

[3] 鲁迅：《影的告别》，《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

与沉重感，展现了那种被抛离了传统轨道，又不能毅然前往进化的黄金未来的世界的深刻游离。

由此而言，鲁迅笔下的“恶魔诗人”拜伦，内涵是复杂而又独异的，关联着具有鲜明鲁迅特色的精神世界。这种“独异”，在与采用了同一叙事脉络的《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的对比中，凸显得更为清晰。

三、王国维：为“无智之情”所主导的“主观诗人”

王国维几乎在同一时期（1907），发表了与《摩罗诗力说》行文结构类似的《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1]。然而化身为“白衣龙”的拜伦，无论与鲁迅笔下的拜伦，还是苏曼殊所诠释的拜伦，都有着不小的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与《摩罗诗力说》两篇文本，二者的叙事脉络基本相同，均按照时间顺序大致交代拜伦的生平基本事件和主要作品，且从作传的角度记叙了传主拜伦一生中的一些重要时期的事迹与行状。然而在叙事的重点和凸显的细节上，却显示出了鲁迅与王国维个人化的特点，这种展示的重点的差异，正好折射出了作者个人理解和思想资源的不同之处。故本节欲基于文本细读，于比较中显现二者对于拜伦阐释的特点。

王国维和鲁迅所叙，均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基本内容：

---

[1] 王国维：《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王国维著，佛雏校：《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6—289页。

——家族及幼年时期介绍；

——求学剑桥；

——离开剑桥做第一次漫游，归国后由《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前两篇成名；

——作《异教徒》《阿拜多斯的新娘》《莱拉》等作品时期；

——离婚事件，离开英国第二次漫游时期——援助希腊，病死军中。

在对拜伦的家族及其幼年的记述中，鲁迅的记叙显然是非常简略的；而王国维却不仅介绍了拜伦的幼年，而且还展现了其父母生平的某些细节——换句话说，也就是展现了其成长的家庭环境。王国维的笔触虽然简练，但却完整交代了其父先是引诱妇人私奔，而后又虐待该妇人并夺其资产，最终客死异地这一事件。论及其母，则言其母性情激烈、起伏无常，并提及拜伦和母亲激烈冲突时，拜伦甚至以小刀架于自己脖颈之上等细节。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一个人的性格及日后生活方式的“脚本”，往往是由其童年时期的家庭生活塑造的，其日后的人际关系模式，很大程度上也会重复他与父母的相处模式以及他在成长环境中所学会的经验。王国维挑选了这些细节来写，这样的展示或许与他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背景与写作视角有关。[1] 拜伦幼时家庭生活的动荡或许正映照着他自身日后

[1] 据王国维年谱显示，王国维于1903年前后，与通州师范学校签一年合约，教授心理学与论理学（原文如此），并对于丹麦心理学家海甫定的著作有所涉猎（赵万里：《民国王静安先生国维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6页）。与此同时，王国维一直对教育领域有着密切的关注，常就相关问题发表文章。

的婚姻生活，他母亲激烈及起伏不定的性格，或许正是拜伦性情“亢傲”（王国维对拜伦性格的概括）缺乏情绪自制的缘起。由这个叙述角度来看，拜伦的反叛性格，反而倒是基于一种性格缺陷了。

对于这一时期的记叙，鲁迅和王国维均提到某个年龄节点的细节，但鲁迅仅以“十二岁即为诗”[1]一笔带过；而王国维不仅写其十一岁时意外得遗产并袭男爵，并且还记叙了其好交游，且“自幼即知恋爱”，且在十二岁“慕其中表妹，至不能寝食云”这样的内容。[2]

在剑桥求学一段至拜伦写出《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成名一段，王国维详写拜伦如何得了批评家的酷评，并立即写文回敬（《英格兰之诗人与苏格兰之批评家》）；如何梦想着漫游大陆，后果然成真，有着许多细节的展示。而此处鲁迅只以“长游堪勃力俱大学不成，渐决去英国，作汗漫游，始于波陀牙，东至希腊突厥及小亚细亚，历审其天物之美，民俗之异，成《哈洛尔特游草》（*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二卷，波谲云诡，世为之惊绝”[3]一笔带过。

紧接此而在提及《异教徒》与《阿拜多斯的新娘》《莱拉》之前，王国维叙述了拜伦成名后三年如何在交际场中“亦大擅盛名”[4]，不仅荒疏正业，且“酒色征逐，般乐以遨，卜昼不足，

[1]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7页。

[2] 王国维：《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王国维著，佛雏校：《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第287页。

[3]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7页。

[4] 王国维：《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王国维著，佛雏校：《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第287页。

继以夜月，且往往通宵不寐，惟以痛饮为事”[1]——这样的行为，或者恰好正重复了其父亲的行为模式，且与他“自幼即知恋爱”一脉相承。而拜伦形象的这一侧面，是包括鲁迅在内的时人均很少提及的。

对于《异教徒》与《阿拜多斯的新娘》《莱拉》三部作品，王国维的介绍是简略的，而鲁迅则以详尽的笔触叙述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尤其详述了《海贼》一篇这一未为王国维提及的篇目。由上述鲁迅部分的论证可知，鲁迅对这些作品内容的详述，实际上是服务于塑造完整的拜伦性格的，而王国维出发的角度显然并不在此。

在拜伦离婚一节中，《摩罗诗力说》中所述的“世所不知”的“去之之故”[2]（指与妻子离婚），王国维点破其缘由：“妇惊其行为无律，以为狂人，因召医士诊之，无疾，愈惊，遂请去，于是离婚。”[3] 由其妻子对于拜伦的评价侧面反映拜伦性格，此处所显示的拜伦，显然也不是一个具有健康性格的人。而世人就此詈骂拜伦，鲁迅就此发表了一段世人“窘戮天才”，拜伦树大招风而顽愚妄自附和的议论，并借此抨击了“颂高官而厄寒士”的东方恶习。[4] 这件事在王国维的叙述中，却成了拜伦创作《苛林斯之围》《巴黎人》等作品的心理动因。[5]

---

[1] 王国维：《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王国维著，佛雏校：《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第287页。

[2]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8页。

[3] 王国维：《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王国维著，佛雏校：《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第287页。

[4]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8页。

[5] 王国维：《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王国维著，佛雏校：《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第287页。

至于拜伦因此离开英国，鲁迅所提及的细节显然让拜伦的形象凸显出了其骄傲的一面："使世之评骘诚，吾在英为无值，若评骘谬，则英于我为无值矣。吾其行乎？然未已也，虽赴异邦，彼且蹑我。"[1] 拜伦的自尊与自负跃然纸上。并且，在鲁迅的叙述中，此后的拜伦创作是由此"乃益雄"[2] 的。而王国维笔下，此时之拜伦则更像是被迫出走，因而气急败坏，由此"肆扣痛詈英国之宗教道德政治等之卑劣，以泄其郁怒"[3]，而此时拜伦"渐耽酒色，悖理之行渐多"[4]，此后更是"数年来往来于塞纳－马恩省亚、雅典二地，其行愈荡佚"[5]，越发地像一个无家的浪荡子了。

加上用简笔叙述拜伦最后死于援助希腊之行的事迹，王国维对拜伦的行迹创作介绍的主体部分在此就基本结束了。而鲁迅的记叙、介绍部分却远远还未结束：不仅有对《曼弗雷德》《凯因》《天地》等作品的详细讨论，拜伦对于意大利和希腊的援助等事迹，又占据了整个拜伦部分的另一半的篇幅。尤其《天地》中有关善恶、神魔的探讨和拜伦援助希腊前后，更是鲁迅详述的重点。[6]

由上述简要比较可知：二者虽大致记叙了相同的事件和作品——因为一个人一生的主要事件是基本固定的，但显然二人对基本事件的阐释和评价却并不相同；与此相应，所记

[1]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9页。

[2] 同上，第79页。

[3] 王国维：《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王国维著，佛雏校：《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第288页。

[4] 同上，第288页。

[5] 同上，第288页。

[6]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9—81页。

叙的详略、展现的细节也不同。这其中的对比显然是十分有趣的，分别都服务于作者的写作重心。

王国维对于拜伦的核心评价是“一纯粹之抒情诗人”[1]，“即所谓‘主观的诗人’是也”[2]。在他的叙述中，拜伦情感丰富、强烈乃至于不能自制，为人多情甚至于浪荡，而拜伦的厌世及与众人为敌等，往往与此相关，并无更深刻的哲学、美学、宗教学背景。

王国维写道：

> 盖白衣龙非文弱诗人，而热血男子也，既不慊于世，于是厌世怨世，继之以詈世；既詈世矣，世复报复之，于是愈激愈怒，愈怒愈激，以一身与世界战。夫强于情者，为主观诗人之常态，但若是之甚者，白衣龙一人而已。盖白衣龙处此之时，欲笑不能，乃化为哭，欲哭不得，乃变为怒，愈怒愈滥，愈滥愈甚，此白衣龙强情过甚之所致也。实则其情为无智之情，其智复不足以统属其情而已耳。格代之言曰：“彼愚殊甚，其反省力适如因而。”盖谓其无分别力也。[3]

可见，在王国维的诠释中，拜伦之与众人为敌，是因其自身性格情感充沛且奔放外露，但这样的情感外露是缺乏智性的统帅与制约的。其“与世之冲突非理想与实在之冲突，乃己意

---

[1] 王国维：《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王国维著，佛雏校：《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第288页。

[2] 同上，第288页。

[3] 同上，第288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与世习之冲突”[1]，概而言之，则是如婴儿一般全能自大的思维方式，欲以自身之意志强制性改造世界，进而生冲突。如若不能遂意，则大哭大怒、不能自止。这是王国维对拜伦之独自对抗他人及社会的理解。

在鲁迅的阐释里，拜伦的核心性格为“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2]，其厌世与独战众数，正是基于一种个体的自我觉醒及高度的人格独立后而产生的结果与状态，而这恰恰是对拜伦的心态行为一种非常带有哲学性的理解。这种哲学性的理解，恰是鲁迅与王国维乃至苏曼殊的区别所在。如前文已提及，王国维认为拜伦：“其情为无智之情……其多情不过为情欲之情，毫无高尚之审美情及宗教情。”[3] 而相对于苏曼殊，这种“哲学性”的理解也是鲁迅与苏曼殊笔下更具有“维特式才子”特征拜伦的重要区别之所在。李欧梵在论述中国文人对于“维特式浪漫英雄”的接受时曾谈道：

> 少年维特……他的爱情苦恼见于他强烈的情感。……但维特重要的一面被他的中国崇拜者忽略了。他的苦恼不止因为单恋，还包含一些哲学意义。维特是所谓悲观浪漫主义的受害者，由于个人理想与环境现实之间的差异，产生消极并往往是悲观的情绪。歌德在《对维特的反省》中，自己形容这种情绪接近于

[1] 王国维：《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王国维著，佛雏校：《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第289页。

[2]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84页。

[3] 王国维：《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王国维著，佛雏校：《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第289页。

那种在最和平的情况下，对生活感到厌倦。……充满主观情感的五四青年，完全忽略了这种悲观的特征。[1]

鲁迅对拜伦的阐释，显然不仅注意到了拜伦“所遇常抗”[2]这一非常富有“力”的一面，且同时也注意到了拜伦带有哲学意味的悲观的特征。这是鲁迅的理解较同时代人如苏曼殊，乃至后来的“五四”浪漫派深刻的地方。

四、结语

由上可知，苏曼殊笔下的拜伦，是一个有着家国情怀的义士[3]，着重于恋爱及恋爱描写的、性格热情激烈的诗人[4]，糅合了充满着“孤愤酸情”[5]、脂粉愁泪的传统士人形象。而苏曼殊对于浪漫主义风潮的影响，与其说是通过他的著作及译介，不如说更源于其本人率真、孤愁、多情的浪漫言行的感召。

与苏曼殊相比，王国维和鲁迅对于拜伦的阐释显然都是更富于现代意味的。当苏曼殊仍然以一种传统资源去融合拜伦的浪漫精神时，王国维和鲁迅对拜伦的理解与阐释，显然已经更多地借用了西方的理论资源（如心理学和非理性主义哲学）。

---

[1] 李欧梵著，王宏志等译：《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第2版），第293—294页。

[2]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84页。

[3] 见《〈潮音〉跋》中对拜伦形象的描绘（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版］第1卷，第85页）。

[4] 见《潮音自序》中对拜伦的描绘（同上，第89页）。

[5] 同上，第27页。

分而言之，鲁迅笔下的拜伦：一方面，富于反抗精神，具有强力意志、强烈的复仇心态，有如狂涛厉风，争天拒俗——这是鲁迅意欲突出的拜伦的性格的主要侧面，也历来为人所强调；另一方面，笔者认为，由不平而厌世，厌世而希灭亡，为人楚毒而至于破坏复仇，或者蔑视道德而嘲弄社会——这是与强力的英雄性格同样重要的另一个侧面。拜伦作品的主角：哈洛尔特的厌世情绪，曼弗列特的自我毁灭倾向，康拉德和路西法的复仇、破坏、毁灭心理，唐璜的玩世不恭，这些都是拜伦性格中的应有之义。这样的拜伦中所寄寓的，一方面是对传统压抑个人的批评；另一方面，鲁迅又借此表达了对于与“启蒙理性”密切相连的科学、民主思想，这些思想对个人造成新的压抑的质疑。一种既不属于过去、亦不属于未来的深刻游离的孤独，就在其中。

与此同时，与苏曼殊和王国维都不同的是：鲁迅略去了拜伦的享乐主义与其多情浪荡的一面。可以说，鲁迅展现了具有文化意图和哲学意味，内在充满张力与悖论的恶魔诗人拜伦形象，其复杂深刻的一面恰恰使他难以被归入某种潮流之中：无论是鲁迅本人，还是摩罗诗人（或许可说，鲁迅本人正是他所推崇的“摩罗诗人”最忠实的践行者），他们都是“蔑视所有同盟特性的孤立的巨人”[1]。但同时，由此我们或也可以理解为，鲁迅对拜伦的阐释，是更为理念性的、抽象的、理想的。

而王国维对拜伦的核心评价是主观之诗人，他性“亢傲”[2]，富于情感，但却是无智性统帅、缺乏分辨力之情及情欲

[1] 李欧梵著，王宏志等译：《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第2版），第27页。

[2] 王国维：《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王国维著，佛雏校：《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第286页。

之情，毫无高尚审美情与宗教情（与鲁迅笔下拜伦“没有条件的、服从超命令的、宗教意义上的献身”[1]的人道主义内涵恰好形成对照，前已论述，不再赘述）；由于其易激易怒，故而好战；故而写作成为其一泄郁愤的方式，这是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阐释了其创作的动因。在王国维的书写中，拜伦幼年成长环境的细节，与其性格因素显现出了关联。这亦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为凡俗，却也更为真实而富于血肉的拜伦。

但无论是苏曼殊的现代西式个性自由与传统才子情调的糅合，抑或是鲁迅所绘拜伦形象所展现的“丰饶的含混”[2]，或是王国维笔下的凡俗多情的拜伦，都展现出20世纪初期浪漫主义在中国传播伊始多样的面貌。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积极而热情地将目光投向这些外来思想、文学资源，作为一种新的、自我觉醒后的精神资源的参照。他们对于相近的资源所做出的不同吸取形成的对照，这种参差的面貌，或进一步让我们产生一种更高的“自觉”，即：当我们在谈论浪漫主义、个性主义等话语及相关内容时，其最初的话语“生产”过程细节，是为如何；我们所谈论的“浪漫主义”，是否经历了翻译译介的“曲光镜”，而或许正是不可避免的传播过程中的“曲光镜”下所生产的“知识”，塑造了我们后世对西方浪漫主义的共同想象？这或许能使我们获得一种“审视的距离”。若如此，则是本文能为读者所提供的微小价值。

---

[1] 林毓生对鲁迅所自述的“人道主义”的内涵的解释（林毓生：《热烈与冷静》，第187页）。

[2] 林毓生：《热烈与冷静》，第182页。